



聚焦
jujiao

“坡度落差式”救灾的考验下——

公益组织救灾专业性仍待提升

本报记者 顾磊

“我们调用多艘船艇和水陆两栖车从两个方向突破，目前已经转移出了数百名群众，有孩子、老人和伤员等。”8月4日，记者拨通正在现场指挥的一位救援队长电话时，只听见他声音嘶哑，正在指挥救援人员对仍处于“孤岛”状态的涿州市水岸花城小区进行紧张有序的救援，“现场除了我们，还有其他救援队参与，如果天气不发生突变，今天能实现全部居民转移。”

据了解，该救援队伍在涿州集合了队员135名，船艇22艘，救援车辆36辆，另有指挥车、重型保障车、水陆两栖车、医疗救护车、卫星通信车及配套设施、热成像无人机等专业救援设备。

截至记者发稿，京津冀暴雨灾害的后续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多家公益组织积极响应，调配人员、物资、资金支持受灾地区，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之一。

历次救灾中，信息传递与救灾成效息息相关，以往曾发生因信息传递有误导致救援力量扎堆、过剩，受灾严重地区反而缺少支援的情况。中国社工联合会应急与救灾社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简称“卓明中心”）创始人郝南告诉记者，较之2021年河南水灾救援，本次救灾中的信息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气象部门发挥了专业性优势，预报科学准确，并且做了很多科普工作，极大地消除了公众的一些误解。灾情进展与气象预报形成了一种呼应，线上志愿者招募和沟通井井有条，互联网‘大厂’们也有了经验，各自启动信息灾情的通道，与国家减灾中心合作，合力开展信息化技术支持工作。应急管理部门也密切关注社会化信息，将其补充到调度决策中。”郝南用“清明”来形容此次灾情信息传递和沟通的空间。



救援队在灾区展开救援

公益慈善组织中，众多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捐赠。8月2日至3日，多家互联网企业所属的基金会先后宣布，将提供大额捐赠支持京津冀豫等地抗汛救灾和灾后重建。不少长期开展减灾防灾和救灾工作的基金会具有较为成熟的救灾经验，行动迅速。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为例，该会于7月31日上午11时启动灾害救援响应，动员人道救援网络伙伴中的7家就近或有专业优势和特点的机构到河北多个点进行服务，并派遣一支救援队开展救援工作，同时不断推动过渡安置进展和需求调研。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灾害救援项目部主任朱一存告诉记者，基金会启动响应时有基本预判，并形成清晰思路。“第一阶段是安置人员的保障阶段、应急救援和受灾人群的转移阶段，设立深水、阜平、涿州、邢台、天津西青5个工作站，主要支持救援

队和发电机设备12台，食品水及3个批次人道救援保障箱1500份，以及粮油等保障物资；第二阶段是过渡安置阶段，主要工作是推动快速恢复家园，恢复一些必备的基础设施；第三阶段是灾后重建阶段。”朱一存说：“很快我们会转入到过渡安置、社区服务，并且推动当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公益组织参与救灾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社会动员与社会关注高度相关，容易形成救援资源不平衡的现象——受到大量关注的受灾地区，社会捐赠热情高涨，其他地区则受关注不够，筹款和救灾较为困难。对此郝南认为，公益组织救灾应多样化开展，要对那些关注度不高且受灾严重的地区予以支持。

此外，暴雨、山洪等造成的灾情错综复杂。行洪区、蓄滞洪区和泛洪区等区域，受灾的时间节点、阶段和

灾后需求各不相同，郝南称之为“坡度落差”。卓明中心向各家基金会救灾提出的建议中也对此进行了强调，“建议关注山洪区的家园重建需求，关注过洪区（洪水已经退去的灾区）的家园环境卫生恢复需求，关注非蓄滞洪区社区的生计需求，关注涿州以外河北、河南、山西其他重灾区的需求，并且关注东北地区汛情。”郝南说。

“坡度落差式”救灾是对公益组织的巨大考验。郝南也认为，公益组织能力仍然不够，往往只熟悉其中一种或几种救灾场景，而不是熟悉全部场景。

记者获悉，目前，处在一线的多支救援队伍，专业水准参差不齐，现场仍有直播作秀、虚报数字等不合理现象发生，甚至还有不携带任何装备直接赶往现场“借”设备干活的“乞讨式救灾”行为存在。

具体到专业救援机构近年来发展状况，前述救援队长认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专业的越来越专业，不专业的越来越不专业。”

该救援队长认为，救援队伍应将安全意识摆在首位，严禁单艇作业，现场要及时架设通讯设施，进行远程调度；在工作方法上，许多救援队只做“点”上的工作，忽视了“以点带面”，即通过调度集合力量连续攻坚单点，形成面上的突破。他建议，民间救援队伍应从安全、理性、自律等方面加强建设。

“我们建议公益组织能够根据自身专业能力、灾害实际情况与需求来开展服务，发挥自己的专项价值，这样有助于体现社会组织服务的成效。”朱一存说。

未来，公益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救灾？

郝南建议从基础建设上发力，熟悉和了解气候适应性，掌握气象、水文等方面的知识，提升救灾能力。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救灾工作应向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努力提升和迭代救灾技术。

应急救护技能，如何“加急”？

“台风天急救指南”“泥石流来临如何躲避”……最近，极端天气中自救与互救知识频上热搜。大家对应急救护技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然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懂自救、能自救的人占比仍然较低。如何加快推广应急救护技能？记者进行了走访。

越来越多人学习应急救护技能

7月31日至8月4日，太原市民孙杰一直在河北保定参与救援工作。“90后”孙杰是一名网约车司机，2022年出于一腔热情参加了救援队。此后，他每周末都会参加水域救援、山地救援等培训，很快成为一名颇有经验的救援队骨干。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像孙杰一样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期望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和他人。以天津市红十字会为例，今年上半年培训近3万人。暑假是应急救护培训的旺季，这个假期报名人数同比增长20%以上。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持续推进相关技能培训。2022年，甘肃省各级红十字会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29.97万人次，培训救护员5.02万人次；四川省普及培训97.6万人次，培训持证急救员13万人次。杭州推出救护技能公益培训项目，考核通过的人将获得“电子救护员证”，持证救护员可通过小程序注册成为“急救侠”，接收附近的求救信息、参与救助。

1%普及率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急救培训工作进展较快，但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掌握救护技能的人员比例仍然较低。记者了解到，普及率较低背后是应急技

能培训人才匮乏。一位医科大学负责人反映，医学院课程体系，急救、灾害、重症医学和医学救援等技能的系统训练相对较少，急救人才队伍建设已经落后于医学救援事业发展需求。

市场化应急培训潜能也有待释放。一家气象科普展馆建设方负责人说，气象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馆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得到青少年青睐，但目前规模还不够大，常态化开放、运营管理有待进一步健全。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造了应急安全产业园区。深圳市应急安全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河生介绍说，部分产业园区的应急安全产业目前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市场化的应急培训潜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如何实现3%的目标？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鼓励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到2030年将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提高到3%以上。为稳步实现这一目标，专家呼吁进一步加快普及群众应急救护培训。

多位专家认为，应由相关部门编制科学规范统一的教材，由国家主管部门审定后，向企业、学校、社区及社会服务行业推广。同时，应利用好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急救知识。

据了解，目前应急知识进校园多为临时性讲座，比较简单、不够系统。专家呼吁应将应急知识作为大、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固定下来。

此外，应加强对市场化应急培训教育、应急培训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使其成为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的有力帮手，快速提高应急培训普及率。

（据新华社）



“集善阳光鹿童”启动脑瘫儿童康复基地

本报讯（记者 顾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阳光鹿童”公益项目脑瘫儿童康复基地日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阳光鹿童康复中心启动，首批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脑瘫患儿及家属入驻基地接受康复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龙墨表示，“集善阳光鹿童”公益项目已经连续实施10年，为北京、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的千余名脑瘫儿童提供了康复服务，脑瘫的康复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不仅需要家长们的不抛弃不放弃，更加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与关爱，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这个队

伍中，助力脑瘫儿童茁壮成长。

“集善阳光鹿童”公益项目汇聚众多爱心人士的力量打造康复基地，为全国家庭困难的脑瘫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该项目以善款募集为依托，以筛查评估为指引，以基地康复为基础，以居家康复为支撑，构建“四位一体”的康复救治体系，每位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可获得6个月基地康复和6个月居家康复指导服务。据了解，这种基地康复模式既能帮患儿家庭缓解康复资金压力，又能有效管控儿童康复质量。与此同时，家长还将得到居家康复训练技术的专业培训和对一对一指导，为保障孩子的长期康复效果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委员爱心驿站护航留守儿童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 通讯员 王源文）“委员爱心驿站”，是一项事关“民生”的硬工程，也是关切“民心”的软情怀。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政协委员爱心驿站揭牌暨上海建宁商会捐赠仪式近日在建宁县闽江源小学举行。

这是建宁县第二个政协委员爱心驿站。据介绍，县政协将以此为抓手，持续深化“政协委员护航”留守儿童工作，发动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为全县留守儿童出资出力献爱心，对各类服务项目进行资金民主监督，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政协委员护航”留守儿童这项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保障。

“政协委员护航”留守儿童工作是建宁县政协“四大”攻坚行动任务之一。今年以来，县政协不断加大工作力度，“2+1”结对帮扶行动、节日温暖行动等委员护航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据统计，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县政协委员中已有近半委员参与“护航行动”，累计筹措爱心款80余万元，组织开展主题活动130多场次，服务留守儿童2000多人次，为助推全县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传递社会爱心、促进社会和谐奉献了政协力量。



委员送来“文化公益小课堂”

传统文化新解、非遗演出进课堂、非遗体验……这个暑期，丰富又生动的文化课堂轮番登场，让山东省庆云县的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多彩魅力。据悉，近年来，庆云县政协委员结合自身所长，将刘贵哈哈啦、如意剪纸等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文化转化为丰富课堂内容，走进文明实践家庭站，常态化组织开展暑期“文化小课堂”活动，为学生送上夏日“文化大餐”，解锁多彩暑期。图为庆云县政协委员志愿者们在为孩子们们讲授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创新客
chuangxinke

成都：社区社会企业有“新益”

本报记者 顾磊

在创新政策的推动之下，四川省成都市已成为国内社会企业发展“高地”，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更小型、更贴近社区与居民的社区社会企业正在悄然增长。

社会企业是以有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持续用商业手段提供产品或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并取得可测量的社会成果的新型企业或社会组织。成都市认定的在有效期内的社会企业有126家，这些机构上一年度营收总额超7.48亿元，累计服务各类城乡社区700余个，受益人群超100万人次。

目前，成都正推动社会企业向社区下沉，使其社区服务日趋丰富。部分政协委员也成为社会企业的探索者，为推动其发展建言献策。

家门口的社会企业

70岁的甘华富师傅是一名有56年经验的老裁缝。几年前退休后，总觉得无事可做。而同时社区里的裁缝服务却日趋缺乏。如今，在成都市十八匠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工位上，甘师傅实现了“再就业”，每月可增收近3000元。



甘华富师傅在社区社会企业实现“再就业”，社区居民也得到了便捷的服务。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十八匠”是成都正在大力推广的社区社会企业模式。该公司由社区居委会以特别法人身份全资成立，由社区两委等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和运营。魁星楼社区工作人员王媛介绍说，公司设理发、缝纫、维修3个固定摊位，结合巡回服务提供便民服务，目前已开展公益服务200余次，收益近3万元，均被用于社区公共服务。

据郫都区社治委副主任周奕汐介绍，该区去年出台了社区社会企业培育办法，形成了“一库、一中心、一平台、一学院”的发展态势，其中的“一库”是社区社会企业库，目前已有16家机构入库，每家可获1万元“天使资金”助力发展。

在武侯区七道堰社区，一张大屏清晰地显示收支账目的实时情况，这是社区信托制物业开展工作的场景。社区书记陈懿介绍说，该社区流动人口较多，老旧院落有62个，缺少物业服务。2021年，社区成立四川制稻社区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信托制物业服务探索解决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难题。公司整合社区的物业服务资源，成立社区信托制物业服务中心，统一调配环卫工、水电工等服务人员；同

时将老旧院落导入信托制物业服务，迄今已导入6个小区，服务1000余户居民。陈懿透露，近期将新增导入4个院落。

社区社会企业提供的物美价廉、有新意的公益性服务，正是那些商业领域不提供或高价提供的服务。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夏璇表示，社区社会企业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社会企业”，其核心在于“治理、服务、发展、保障、互助”统筹发展。

可持续发展呼唤政策创新

在成都，社区社会企业往往结合自身独特资源追求可持续发展。在郫都区郫筒街道的书院社区，盘活社区闲置土地资源创新做法被多方认可，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一张“名片”。

书院社区书记黄菲介绍说，针对小区里不适于建筑用地的“三类地块”，与有关部门协商后，通过社区营造等手段，以探索农耕文化为路径，让居民免费认领种菜的“格子”，并负责认领地块的卫生。社区还开展农夫市集活动，售卖蔬菜获得收入后，捐赠给社区独居老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项的协商决策中，形成了社区治理的良好氛围。

书院社区于2018年10月成立了书院家居服务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之一是基于书院社区治理的研学业务，还代理生态产品、运营公共空间拓展业务。黄菲说，社区今年计划召开居民议事会，引入社区合伙人，盘活闲置空间。

对于社区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黄菲希望有更多政策性突破，其一是完善公司组织管理架构；其二是建立社区社会企业的机会清单，“例如区级招标代理项目，社区公司可以去竞标，能就近解决灵活就业。”

委员建议改善“营社环境”

成都市成华区政协常委熊红霞是社会企业的探索者，10年来，她的